

重塑边界：移动媒体中介下的空间实践

曾薇

摘要：移动媒介出现之后，在新介质的连接下人们的空间感知如何发生改变？进行着怎样的空间实践？文章尝试以中介化理论为脉络，以技术为线索，探讨传播媒介与社会空间的互构关系，并借此管窥当代人的生存状态。文章通过对上海、杭州、南昌、萍乡四地59位手机用户调研后发现：首先，作为中介的移动媒介型塑了人们的空间认知感觉，物理空间肉身在场的单一状态被远程在场、缺席在场等多重中介化在场状态所取代；随着在场感的改变和Wi-Fi边界对实体边界的渗透和僭越，引发了心理边界的和物理边界的重塑；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借由移动媒介脱离既有空间，颠覆结构性的角色身份，打破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壁垒，构建了一种融合、流动的生活空间。

关键词：空间实践；中介化；边界；移动媒介

作者简介：曾薇，女，讲师，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9) 04-0015-09

一、问题的提出

移动媒介出现之后，新的传播技术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有人说，它以一种“既隔离又连结”的方式塑造了新的人际关系；^[1]有人说，它以贯通衣食住行多重场景的技术手段构建了新的都市生活方式；^[2]也有人说，我们目前生活的空间，正在经历着由移动媒介技术所带来的融合与颠覆。尤其是自从卡斯特扼住信息社会“流动性”的特性，指认了“流动空间”这一现代社会“支配性的空间逻辑”以来，^[3]传播技术与社会空间的互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人们充分利用各式各样的地理隐喻，来对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进行理解和阐释。例如“网络空间（cyberspace）”^[4]“狭隘空间（parochial space）”^[5]“混合空间（hybrid space）”^[6]等等。在这些新型的空间中，人们普遍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新的移动通信技术正在重塑公共和私人生活。^[7]它们“模糊了物理和数字空间之间的传统边界”，^[8]“为公众参与创造了新的时间与空间”。^[9]看上去，现代社会空间的融合性与流动性已成为一个公认的既定事实，它既是学界掌握当下技术环境的重要特质，也是展开后续研究的关键起点。

然而，公/私生活的融合是如何发生的？流动的社会空间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都并未从经验层面获得足够的支撑，也鲜有人深究其在经验层面的合法性。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经验世界出发，对移动媒介中介下的空间实践进行探讨，尝试解决“在新介质的连接下，人们的空间感知如何发生改变，进行着怎样的空间实践”这一问题，并且希望借此讨论传播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为此，笔者于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期间，对上海市、浙江省杭州市、江西省南昌市以及江西省萍乡市等四座城市中的59位智能手机用户进行了深度访谈，并于2017年7月至8月对其中部分受访者进行了二次回访，以期对研究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城市的选择主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程度、互联网生活发达程度、区域位置、人口规模等因素。受访者的选择采取滚雪球的方式，以智能手机使用者为基本条件，从作者日常交往圈出发逐渐往外扩散，在对象的选择上尽量考虑样本的代表性。在59位受访

者中,男性占51%,女性占49%,与智能手机用户性别比例相当;^①年龄分布上20—29岁占32.2%,30—39岁占37.2%,40—49岁占13.6%,50—59岁占8.5%,60—69岁占8.5%,基本上符合智能手机用户年轻态的现状;^②在职业上,包括大学生、教育工作者、公司白领、全职妈妈、个体老板以及城市中的蓝领阶层。其中还涉及几位兼职提供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的对象,他们有的在业余时间开专车,有的在微信上开网店。这些受访者鲜活多彩的生活经历,有效地丰富了本研究的内容。

访谈的方式采取半结构半开放式。根据正式访谈前受访者填写的调查问卷进行访谈,同时结合受访者手机设置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现场提问。所有的受访者均知情同意,由于部分内容涉及隐私,笔者在文中对他们进行了匿名处理。

二、空间实践与技术中介

在社会理论中,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会的表现(expression),是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的物质支持。^{[3](505)}社会空间支持着特定的空间实践,而空间实践也激活并生产着社会空间,空间实践理论讨论的日常生活,“就是介入、挪用权力和空间的方式。”^[10]空间不是给定的或不可更改的,它始终经历着被不断更新、创造的过程。所以,“每一个社会,每一个生产模式,每个特定的社会关系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独特空间。”^[11]而在传播学视野下,许多学者恰恰认为,正是传播媒介,为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空间的重塑带来了契机。正如电子媒介突破了物理空间的藩篱,构筑起了“消失的地域”一样,当移动媒介技术介入之后,传播方式的改变势必带来全新的空间实践,构建全新的社会空间。

事实上,当我们将传播技术与“重塑”“构建”等词联系在一起时,技术便已脱离了“控制”和“劝服”的议程。这也意味着在这种思路背后,蕴含着对传播技术不同以往的定位。近年来,类似的传播理论讨论很多,其中,英国学者西尔弗斯通关于“中介化”(mediation)概念的论述自成一脉,他以此构建起了一套关于传播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独特理论进路。

中介化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首先,“中介”这一术语超越了单一的媒介文本和效果分析逻辑,强调的是传播媒介中介化的过程,以及对世界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现方式产生的重大影响。^[12]如同西尔弗斯通所说:“这种中介化的呈现反过来又为我们定义和经营与他人的关系提供了框架,尤其是对那些身处远方的人们,那些对于我们来说只出现在媒体中的人。”^[13]其次,与强调技术具有内在发展逻辑的“技术自主论”不同,中介化理论认同的是传播技术与人类社会互相型塑的双重逻辑。它认为传播过程与社会环境互为中介,相互并构,“要求理解传播过程如何改变支撑它们的社会文化环境,反过来也要求将社会视为中介物,制度和技术以及由它们传递的意义,都由接受和消费它的社会过程所中介。”^[14]第三,自西尔弗斯通早年间的“驯化”研究开始,在他的技术观念中始终蕴藏着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即对人能动性的强调。他认为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下,媒介技术介入社会生活的程度是不均衡的。人们对媒介技术的创造性地使用,一方面带来了社会关系和形态的转变,一方面也呈现出了中介过程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因此,在中介化的理论模型中,因果机制不是媒介,而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社会机制或因果机制事件。^[15]人之于媒介技术的“抵抗”力量,让“中介化”更像是一个“战场”,一个“‘理性’设计的、显性运作的权力这个‘战略’与机会主义的、灵活隐性的‘策略’相碰撞的界面。”^[16]

从中介化理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传播技术不是任人操控的工具也不是孕育所有社会变迁的元过

① 根据艾媒发布的《2015—2016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研究报告》,我国智能手机男性用户占52.7%,女性用户占47.3%。<http://mt.sohu.com/20160420/n445119061.shtml>。

② 根据艾媒发布的《2015—2016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研究报告》,我国智能手机用户的年龄分布中35岁以下的占63%,35—45岁占16.6%,46—55岁占13.9%,56岁及以上占6.5%。

程，中介化视野下的传播技术诞生于社会土壤、成型于日常生活，它的出现和演进镌刻着人类社会不朽的烙印。而当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这种中介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和连接时，他们的人际关系、社会形态，都将随着这种被赋予了不同意义的新中介的型塑而发生不同的变化。回到中国的语境下，近年来让人无法忽视的一个现象是，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介，已成为中国网民接入互联网的主要设备。^①当新媒介技术已成为人们连接世界的重要中介，那么在它的桥接下，人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改变呢？

当提及新技术环境下的空间实践时，人们发现焦点已经从物理空间转移到了非物理空间，而空间的涵义也被再三审视：应该将“同时并存之时间的物质支持”这个“空间”的基本概念“和邻近观念区分开来”，这样“才能够解释不依靠物理上邻近的那种同时性之物质支持也有其存在的可能，而这正是信息社会的支配性活动的情形。”^{[3](505)}也就是说，新传播技术对空间实践带来的影响的，关键点在于，技术的介入触发了空间实践中除去物理属性之外的因素。那么，在传播技术、空间实践与网络空间之间的这个关键连接点是什么呢？或许对这个问题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们接纳空间作为一个超越实体边界的概念，认同对空间的界定包含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经由传播媒介进行策略抵抗，这一中介塑造的可能性的话，我们会发现，作为人体感官延伸的移动媒介技术，它所中介的空间实践不是从塑造肉眼可见的墙壁开始的，而是从中介人们的空间认知感觉（cognitive feeling）开始的。换言之，移动媒介触发的空间实践的那个关键点即人们的空间认知感觉，而这种空间认知感觉，即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验到的空间“在场”（presence）。^[17]

三、从“在场”到“中介化在场”

传播学研究的场域中，“在场”关注的是当电子媒介介入之后，尤其是电子媒介建构的虚拟现实的出现，物理空间身体在场状态所发生的变化。事实上，在手机等移动媒介出现之前，人们借由电视、电脑、电影屏幕甚至文学作品，也能在某些特殊或者固定的地点，获得这种多重在场感的经验。然而随着移动媒介出现之后，其移动性（mobility）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空间体验解除了特定时空的约束，随时随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空间实践。

这种经由移动媒介传送的“中介化在场（mediated presence）”，让人们产生与遥远的人事物共同“远程在场（telepresence）”的空间认知感觉，同时相对物理空间来说，又呈现出“缺席在场（absent presence）”的状态。这种复杂的空间感知，打破了原来单一物理空间身体在场的感知状态，由此开始，让身处其中的人们迈出了空间实践的第一步。

（一）远程在场

人们首先会获得一种对远程环境中中介化的感知。这个环境可能是另一个遥远时空的真实环境，也可能是一个由计算机合成的虚拟世界或交往空间。根据空间体验的不同，“远程在场”又包含两种中介化状态：“空间在场（spatial presence）”和“社交在场（social presence）”。

首先，“空间在场”是一种基于技术中介达成视觉“可见”而带来的身体在场的空间体验。空间在场“最核心的维度就是认为身体位于媒介描绘的空间环境中的感觉。”^[18]访谈中，很多受访者都提到了视频聊天的经历，打开手机与远方的亲人朋友视频聊天，他们不需要身体在场于同一时空就可以互相看见，这种中介的可视性（mediate visibility）为构建跨越时空、彼此共在的中介化空间提供了条件。

① 根据《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占总人口13.9亿的58.8%；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8.6%。http://cnnic.cn/guym/xwzx/rdxw/20172017_7056/201902/t20190228_70643.htm.

例如,沈女士离开老家萍乡独自在石家庄打工已经快 20 年了,儿子、女儿、女婿以及外孙都在老家。多年来与家人分隔两地,让沈女士养成了没事就与女儿视频聊天的习惯。“晚上吃完晚饭,收拾好了,洗完了脸,刷完了牙,没事就躺在床上视频。我把手机这么一放(注:沈女士做了一个把手机放在桌子上的动作),就可以视频了,就可以照着宝宝(注:外孙)在这里玩啊,我去上厕所都可以看。”当被问到视频时是一种什么感觉时,沈女士说:“视频的时候呢有一种亲近的感觉。诶,一打开直接就能看见你。打个比方我在北京的亲戚,我们视频聊天,就能他在北京我在江西,这么远的距离,我一下就能看见,好像就在隔壁房间似的那种,很亲近的感觉。”(萍乡 沈* * 52 岁)远方的亲人通过手机屏幕视听呈现,让身处低语境传播场景下的沈女士,即便没有刻意交谈,也能感受到对方在空间中的存在,产生一种仿佛亲人就在“隔壁房间”的“亲近感”。

当 VR 技术介入之后,这种身体在场的空间真实感显得更加突出。小孙是一个电子产品的爱好者,他不久前购买了一个“暴风魔镜”,这是一款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它可以与手机一起配合实现虚拟现实的效果。小孙说,玩游戏时戴着这个“魔镜”给他带来了强烈的“现实感”和“代入感”。“玩的时候,你头扭一下里面的图像就随着扭一下,很有代入感。我玩‘房间逃生’的时候,特别惊悚,那时候真的被吓了一跳。因为画面是第一视角,你在光线很暗的黑屋子里走,突然你面前就会蹦出一个怪物,音乐营造的也是这种氛围,就和看恐怖片一样,那一瞬间没办法分辨是真实还是动画。(问:跟看恐怖片有不一样的地方吗?)恐怖片可能代入感还没有 VR 的强。”小孙说当戴上 VR 设备时,对肉身所处的物理空间就已经“没有感觉”了,“因为听觉和视觉都没法感觉到现实环境的东西了。只有摘下‘魔镜’的那一刻,才有一种回归现实的感觉。”(萍乡 孙* 20 岁)如果说沈女士通过视频感受到的是如同真实空间般的在场感的话,小孙在虚拟现实体验到的则是足以让他产生真实空间感知的空间在场。这是一种心理上脱离物理空间在另一空间的全身心投入,以至于达到空间混淆的地步,小孙说“回归现实”事实上也说明了他在另一空间的强烈感受。

其次,在场感并非仅存在于视觉可见的层面,沿着声音和文字展开的社交互动,同样能构建出一种“社交在场”的交往空间认知感觉。与其他在线参与者连接在一起的沉浸式的“真实感”,^[19]让手机中介的社交空间感知成为了可能。

曾先生退休已经 5 年了,退休后的生活有点无聊。一年前,曾先生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他说自从和老同学微信聊天之后,给他的退休生活“增加了好多好多情趣”。“我们大学同学建立了一个群,目前大概也有 2/5 的人加入了,通过发发微信聊聊天,哎呀,很快就拉近了距离。感觉好像是几十年来这种生疏的感情一下子变得热乎起来了,忽然之间感情变得深厚了,没有这么陌生了。在微信里面,就好像回到了原来在学校里、在宿舍里一样,甚至还要亲热。”久未见面的老同学通过手机中介的社交场景连接在了一起,尽管他们从视觉上“看不见”,但是透过语音和文字对彼此感知“可见”,形成一种如同共同在场的社交空间感受,所谓“情趣”正是从社交中获得的愉悦和满足。聊得开心时,曾先生说他甚至會全心投入其中:“整个人都在这个小圈子里,旁边人跟我讲什么我都会不知道,比方说我在打字你来跟我说事情,我可能就是‘啊’地应付一下,其实耳朵里根本没有听进去。”(上海 曾* * 64 岁)

当然,社交在场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流的场景,同样也包括手机中介的学习、消费、娱乐等其他场景中各种各样的社交在场。多重场景下的社交在场营造出一种全新的人际互动的空间认知感觉。更重要的是,当线上社交与线下社交交织在一起时,人们的空间感知从网络空间延续到物理空间,又从物理空间转移到网络空间,从而形成了一种时刻处于被打乱、交织、重组的、远程在场与物理空间在场互相融合的空间感知。

(二) 缺席在场

在使用手机展开交往时,人们从心理上脱离物理空间进入到网络空间中,呈现出远程在场的状态,

心理与身体的分离使得人们与物理空间的关系出现变化，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物理空间中身心合一的在场感，呈现出一种身体在现场但感知却在远方的“缺席在场（absent presence）”状态。这种空间感知与物理在场相对，在远程在场出现伊始便同时诞生。就像 Katz 说的那样，物理接近度已不再是在场的必要条件。^[20]

例如前文提到用 VR 玩游戏的小孙，戴上“暴风魔镜”的一刹那他就已经远程在场于虚拟现实之中了，对物理空间的无感也就意味着此刻他在这一空间中的缺席在场。全神贯注聊微信而听不见身边人说话的曾先生，也属于同样的状况。

南昌的小邬也说，她和她的前男友经常各自玩各自的手机或电脑，虽然身体在同一个房间之内，但是互相之间缺乏交流。这种缺席在场的状态存在了很长时间，最终导致两人分手。“像我以前男朋友，他就是喜欢霸着个电脑玩游戏、看视频，基本上电脑就没离开过。我们俩坐床上，我拿着个手机，他端着个笔记本，都不怎么说话。因为他看的视频我又不看爱，我就没办法，我就玩手机啊。”（南昌 邬 * * 24 岁）小邬说，其实她很愿和对方面对面地交流，但是电子屏幕却将二人阻隔开来，个人化的手机让他们沉浸在各自的远程空间当中，造成二人在物理空间中的缺席在场，同时也将他们的心理距离越拉越远。

上述案例不仅说明人们对手机的痴迷，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到手机中介带来的多元化的空间在场感，以及以此为基础展开新的空间生产的可能性。必须指出的是，在移动媒介中介的空间实践中，人们的中介化在场并非以单一的形式存在，就像不再以物理在场单一状态存在一样。人们拿起手机实现远程在场，在网络空间不同场景下进行空间在场和社交在场的自由切换，而此时对于物理空间来说，当事人又呈现出一种缺席在场的状态；当放下手机，或者准确来说当人们的意识回到肉身所在的空间时，又会与物理空间的场景进行连接，呈现物理在场。

如大学生小张说，他的室友是个手机控，从早上醒来到晚上睡觉前几乎时时都在玩手机。“你会觉得他每时每刻都在低着头用手机，但是我们干什么事他都知道，我们说什么话他还能接得上。我觉得他是进化了，真的是进化了。”（杭州 张 * * 20 岁）小张对室友的调侃，实际上是对他能够在多种空间在场状态中自如切换的感叹。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体验并不陌生，日常生活经验中人们普遍能感受到通过手机在多重在场状态中随意跨越。而在空间实践中，空间在场感的多元化和多重空间的实时切换则意味着，在场感不再局限于有限的物理空间之内，人们可能同一时间在多个重叠的空间中穿梭，在场于多个空间的同时也可能缺席于肉身所在的物理空间。多重空间的叠置交融，空间之间的无缝连接和切换，随着空间在场感知的中介化，人们体验到的对空间边界的感知也变得不同，它们可能被僭越、可能被重构甚至可能已经消弭殆尽。

四、边界的重塑

边界（boundary）在日常生活领域是“强者”与“弱者”竞争的地点。例如公共广场和建筑的实体空间，权力机构围绕着它们划定边界，绘制并限定了空间内的特定活动。而人们则通过行走和对空间的陈述来对“战略”主导的叙事进行质疑和调整。德塞托在谈论空间实践时，假设物理空间的界限是固定的和有限的，^[21]然而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着剧变。人们借由移动媒介，首先重塑了自身的空间认知感觉，物理空间肉身在场的单一状态被远程在场、缺席在场等多重中介化在场状态所取代。随着空间感知在多重空间中的游移，人与人之间心理边界的限定、区隔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物理空间的实体边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空间实践中边界的内涵得到了扩展。此外，心理界限具有无形、随意、流动的特点，这意味着人们对边界的建立和撤销将会更加随心所欲，对实体空间的抵抗也将更加得心应

手,相应地也将降低实体边界作为空间阻隔的意义。其次,单从物理空间的实体边界来看,由于 Wi-Fi 边界对实体边界的渗透和僭越,人们对实体边界划定的物理空间也出现了重新认定的情况,也就是说,物理边界此刻也遭遇了重构。随着日常生活中的场景秩序的打乱,人们可以借助移动媒介脱离既有空间、征用特定场景,以颠覆或转化某种结构性的角色或身份,从而打破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壁垒,构建出一种融合、流动的生活空间。

(一) 心理边界的树立与重塑

小朱来上海读书已经两年了,因为学业紧张她很少回江西老家。以前回家还能享受和父母在一起的家庭生活,而最近一次回家的经历却让她感觉到明显的变化。“今年我过年回家不是待了将近一个月嘛,本来都很难得的,但是每天晚上几乎都是,我们三个人也不会坐在一起看电视,基本上就是我妈跟我爸一个人玩一个电子设备,我妈可能要不就用手机或者平板,或者是那个电脑吧,然后我爸可能会看电视,也可能就是躺在床上用手机看小说什么的,然后我一个人也是很无聊,只能坐在我自己的房间,玩我的电脑。所以其实跟我在寝室没有太大的差别。”(上海 朱 * * 25 岁)原本看电视还能让三个人聚在一起,而手机、电脑却将他们传送到了各自的远程空间中。无形中的心理边界,造成了一种空间分割的局面,使得小朱产生了一种如同分隔两地,不在同一空间的感觉。随着远程在场的出现,物理空间中的缺席在场也意味着,一道看不见的心理边界正在人与人之间悄然生成。

谢先生是一位公司职员,因为工作的关系他经常需要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每次开会前,谢先生说他都会把手机带上:“实在是太无聊了,本来也没我的事,光是别的部门协调就可以了,但是领导让你去你就必须要去。那能怎么办呢,看手机吧。”(南昌 谢 * * 32 岁)看手机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谢先生有意放飞自己,让自己从身体所处的空间中短暂解脱。大学生小孔还提到她在微信不同的“大群和小群”之间跳跃的经历:“比如说在大群里,偶尔别人会聊一些特别专业的话,我们可能不怎么讲话。然后我们在另一个群里就会疯狂吐槽说,‘哎,讲这话真的一点也不符合什么的,说这怎么能这样呢,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病’之类的话。”(杭州 孔 * * 20 岁)

无论是像谢先生一样从物理空间脱离,还是像小孔一样从远程在场的某个空间跳转到另一个空间,心理边界的树立和空间感知的变化,让人们可以通过手机主动从当下的空间中跳脱出来,随意挪移、进入其他的空间场景,以抵抗特定空间中结构性规则和身份的限制。只要拿起手机,谢先生随即让自己脱离办公室的空间,摆脱公司职员的身份;小孔则在网络空间中找到另一个发表真实想法的地方。他们对空间的感知越来越与心理感知有关,物理边界的限定性也在这种随心、随意的“飞越”中变得愈加模糊。

(二) 物理边界的打破与重构

网络空间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程度的增加,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上海为例,在 2017 年底就已实现全市 4G 网络基本全覆盖。^①这不仅表明在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空间中,网络信号如同基础设施一般成为必须,同时也意味着网络空间日益成为都市人群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于是,人们对空间边界的认定,开始增加了一项除去厚重水泥墙以外由网络信号界定的标准。

首先,人们生活的物理空间被区分为有网络的空间和没有网络的空间,或者有 Wi-Fi 的场所和没有 Wi-Fi 的场所。李先生是一位建筑设计师,繁忙的工作常常需要他回家以后继续使用电脑加班,因此对他而言,家居空间因为 Wi-Fi 的存在而产生了差别。“我一般是在书房,因为我家只有书房和旁边的房间有 Wi-Fi,楼下没有 Wi-Fi,我会等老婆孩子都睡了就在书房做事,如果楼下有 Wi-Fi 也会在楼下

^①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全市 4G 网络用户数达到 2388 万户,比上年末增加 515 万户。i-Shanghai 服务优化升级,完成原有 1400 处场所从 2M 到 10M 的普遍提速,累计开通 2000 处。<http://www.stats-sh.gov.cn/html/sjfb/201803/1001690.html>.

做。”（萍乡李**37岁）可见，Wi-Fi的边界限定了李先生在家中的活动范围，从而将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居空间进行了重新划分。

其次，Wi-Fi信号对物理边界的穿透和僭越，刷新了人们已有的因为实体边界而建立起来的空间观念。换言之，特定空间中Wi-Fi信号的边界，超越了物理界限成为了某些人对空间边界的新感知，甚至重新定义了原本的空间概念。访谈中我们发现，尤其是对于很多没有开通手机移动网络的人来说，他们与随意行走于网络世界的人不同，离开Wi-Fi环境之后他们对于网络空间的脱离感格外强烈，因此相应地他们更易于透过Wi-Fi的边界来重新界定空间范围。

上海的孙女士由于担心操作不熟练而造成流量浪费，所以选择不开通移动互联网服务，于是她只能在固定的空间，比如家中等少数几个有Wi-Fi的地方连接互联网。孙女士说，“从外面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看看谁给我留言了。”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久而久之孙女士对家的空间感知与Wi-Fi的范围连接在了一起，“从外面回来还没进家门就先连上了Wi-Fi，我也觉得进了家门一样。”（上海孙**60岁）从孙女士的话语中可以看到，在她眼里，家的空间概念甚至随着Wi-Fi信号的渗透从四方围墙的边界中延展开来。虽然身处家的围墙之外，但由于连接上了这个空间的Wi-Fi信号，从空间感知上来说，也能产生一种身处围墙之内的领地归属感。更重要的是，网络空间的在场感让人容易忽略物理空间的边界，也就是说，中介化在场和心理边界的树立，将有可能使得物理空间的边界软化甚至消失。作为一种空间范围的界定，物理边界正面临着被解构和重塑的境地。

（三）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互嵌

技术中介下的空间实践以重塑人们的空间认知感觉为起点，而中介化在场则引发了人们对心理和物理空间边界的重构。人们借助移动媒介中介，从一个空间传送到另一个空间，从一个场景转移至另一个场景，模糊了空间的边界，突破了公/私空间的界限，也颠覆了特定空间的结构性身份。在场感的转换、边界的移动、空间场景的融合、身份的杂糅，这一切构成了公/私空间的互嵌。

自称为吴董的吴先生，是移动公司的工程师，同时也是一位“微商”。在本职工作之余，吴董还在微信上经营一家书店以及一个彩票群。因为工作的关系，他需要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回答买家的问题或者用微信收账，这完全打乱了他之前在公司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和相对固定的工作、生活分离的状态。不仅如此，吴董说：“现在所有的朋友约吃饭约打牌都是在微信上面约。”也就是说，同样在手机中介的网络空间当中，面对不同的微信聊天对象，吴董对应的是不同的身份角色和不同的空间场景。跟客户聊天时，吴董是作为卖家在公共空间中远程在场；而跟朋友约饭，则是作为伙伴在私人空间中远程在场。吴董说自己完全可以实现在这两种空间场景的“秒切换”。（萍乡吴**35岁）上一秒还在回复客户的咨询，下一秒就可以换一种语气与朋友开玩笑，再也没有固定的顺序与规则了。“秒切换”言说的，一方面是漂浮在网络空间不同场景之中以及融合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中人们自由而无序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借由手机中介实现的、以个体为中心的、对角色扮演的操控性和能动性。

上海的熊小姐就是这样。但与吴董不同，她感受到的不是“秒切换”的适应，而是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侵占与挤压。熊小姐在一家公司担任公关经理，平时工作非常忙碌，在一个周末的午后，熊小姐与笔者约在了一家甜品店进行访谈。半途中熊小姐手机微信提示音响起，随即我们的访谈中断。在熊小姐看过微信之后，她一脸无奈地将手机锁屏并甩在桌上。熊小姐后来告诉我，是她的老板在微信工作群中针对她的工作提出了很多问题，这让她感觉“很烦”。“我不喜欢在微信里面说工作，就像我刚才看到的那个，说了一大堆，然后其实他也不是很了解这个事实的情况，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了。”访谈快要结束时，熊小姐仍然对刚刚发生的事情耿耿于怀，再次向我抱怨：“我特别不喜欢微信里面的工作群，我只要看到微信群有人新留言我就心情很烦躁。有时候晚上11点半领导在里面发一

堆信息的时候，真的觉得很想发火。”（上海 熊 * 33 岁）微信的出现，瞬间将熊小姐从周末的甜品店拉回到了公司的办公室。如果说吴董借由手机完成了对个体身份的把控和对结构性规则的挑战的话，那么从熊小姐身上我们看到的则是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场景秩序的失控。事实上，与其说熊小姐苦恼的是工作对生活的打扰，不如说是她对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交织重叠状态的不适应。现代社会在移动媒介的中介下，或许每个人都要面对这种脱离了固态时空结构以及线性、规律化生活状态的“流动”境况。

五、讨论：移动媒介中介下的时空重塑

从空间实践上来说，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分离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物理空间的范围限定，二是空间内不同类型实践活动的分离。然而人们发现，这种公/私截然分离的“伟大的二分法”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因为，无论是对于空间边界还是实践活动来说，公/私空间的融合已成为当下有目共睹的事实。公共空间的私人化，私人空间的公共化，公/私空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那么，这种融合的状态是如何发生的呢？从移动媒介技术环境中我们观察到的是，人们在新传播技术的中介下，产生了新的空间感知，并由此引发空间边界的重塑，在新的空间实践中建构出融合流动的生活空间。

当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公/私空间融合的背后有各自复杂的深层次原因，也势必带来更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但是，本文尝试以中介化理论为脉络，以技术为线索切入传播媒介与社会空间的互构关系，尝试抽离出技术中介在空间实践中的行进之路，透过技术的视野管窥当代人的生存状态，或许能够提供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丰富探讨的层次。

由此延展开去，技术中介的空间实践刷新了人们对“可见”“空间”“时间”的固有认知。融合空间中人们彼此可见，这表示我们今天的公共空间所拥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至少部分由中介的可见性组成，用 Thompson 的话来说就是“中介的公共性”（mediated publicness）。“物理空间是组成私有领域的一部分，但它们既不是唯一也不是决定性的东西，它们作为私人领域的组成特征越来越不重要。”^[22]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情境化的，非此非彼可随意转换并拥有无限可能的“阈限空间”。^[23]

如果从传统观念来看，这个由技术中介的空间并不具备空间的特征，同时也颠覆了传统的时间观念。它是一个“共时性的世界”，^[24]是一个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并存的世界。生活在这个空间中的人们，跨越空间共存于时间的一刻，共享传播技术中介所制造的“去空间化的同时性（despatialized simultaneity）”；^{[22] (57)}同时，当“即时性”成为当代文化的普遍样貌之后，时间仿佛只有当下而没有了绵延和流淌，“当下只呈现着四面展开的空间，全球人类处于同一个空间平面上”。^{[24] (13)}

齐格蒙特·鲍曼在他《流动的现代性》当中指明，非结构化、不确定性和流动性成为当前现代性的背景状况。在他看来正是因为人们对接近“瞬时”的时间的把握，成为了流动状态的决定性因素。“瞬时”意味着立即的“当场”实现和完成，人们因此正在“不同程度地接近于不定性”，而一切“永恒的、不可毁灭的基础”都将被打破，如果说“固态的现代性是一个互相承诺的时代，液态的现代性则是一个解除承诺、捉摸不定的时代。”^[25]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我们无法预测，但这便是当下人类生存的境况，是所有人都需要面对或适应的流动时空。

参考文献：

- [1] 黄厚铭，曹家荣.“流动的”手机：液态现代性的时空架构与群己关系 [J]. 新闻学研究，2015（7）.
- [2] 曾薇. 中介化视域下的手机与都市生活方式 [D]. 复旦大学，2017.
- [3]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 [M]. 夏铸九，王志弘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09.

- [4] Graham & Stephen. The end of geography or the explosion of place? Conceptualizing space, pla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8, 22 (2): 165–185. Batty, M. The Geography of Cyberspace [J]. *Environment & Planning B Planning & Design*, 1993, 20 (6): 615–616.
- [5] Humphreys, L. Mobile social networks and urban public space [J]. *New Media & Society*, 2010, 12 (5): 763–778.
- [6] Erickson, I. Understanding socio–locative practices. *Proceedings of the Group 07 Doctoral consortium papers* [M]. New York: ACM Press, 2007.
- [7] Sheller, M. & Urry, J. Mobile Transformation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3, 20 (3): 107–125.
- [8] Silva, A. D. S. E. From cyber to hybrid mobile technologies as interfaces of hybrid spaces [J]. *Space & Culture*, 2006, 9 (3): 261–278.
- [9] Sheller, M. Mobile publics: beyond the network perspective [J]. *Environment & Planning D Society & Space*, 2004, 22 (1): 39–52.
- [10] 吴飞. “空间实践”与诗意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 [J]. 社会学研究, 2009 (2).
- [11]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103.
- [12] Couldry, N., Hepp, A. Conceptualizing Mediatization: Contexts, Traditions, Arguments [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3, 23 (3): 191–202.
- [13] Silverstone, R. Complicity and Collusion in the Mediation of Everyday Life [J]. *New Literary History*, 2002, 33 (4): 761–780.
- [14] Silverstone, R. The Sociology of Medi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Calhoun, C., Rojek, C., Turner, B. S.,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ology*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5: 189.
- [15] Couldry, N. Mediatization or mediatio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s of the emergent space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J]. *New Media & Society*, 2008, 10 (3): 373–391.
- [16] 潘忠党. “玩转我的 iPhone, 搞掂我的世界!”——探讨新传媒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 [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4).
- [17] Schubert, T. W. A new conception of spatial presence: once again, with feeling [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0, 19 (2): 161–187.
- [18] Wirth, W., Hartmann, T., Bocking, S., Vorderer, P., Klimmt, C., & Schramm, H., et al. A process model of the formation of spatial presence experiences [J]. *Media Psychology*, 2007, 9 (3): 493–525.
- [19] Westerman, D., Spence, P. R., Lin, X. L. Telepresence and Exemplification in Health Messag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patial and Social Presence and Exemplars and Exemplification Effects [J]. *Communication Reports*, 2015, 28 (2): 92–102.
- [20] Katz, J. *Handbook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Studies* [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8: 8.
- [21] 米歇尔·德·塞托. 日常生活实践 1: 实践的艺术 [M]. 方琳琳, 黄春柳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43.
- [22] Thompson, J. B. Shifting boundari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1, 28 (4): 49–70.
- [23] 潘忠党, 於红梅. 阈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潜能——一个重新想象传播的维度 [J]. 开放时代, 2015 (3).
- [24] 冯雷. 理解空间：20 世纪空间观念的激变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13.
- [25]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 [M]. 欧阳景根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 13.

[责任编辑：詹小路]